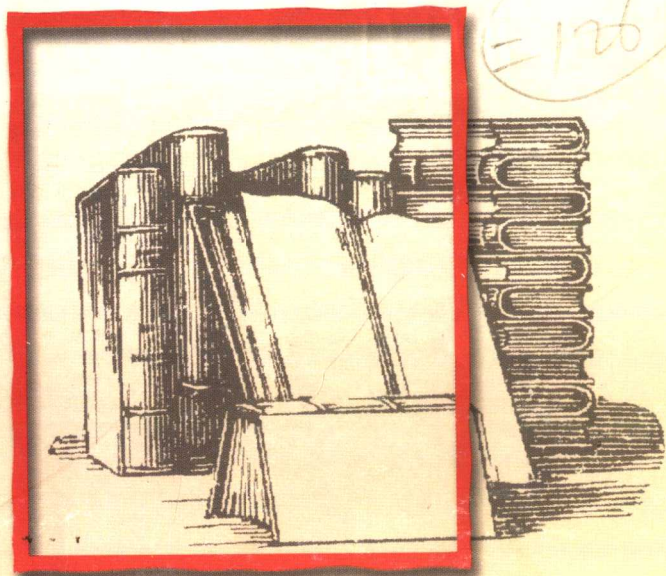


SHIJISHUHUANG

世纪书窗



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义和团运动百年祭

——兼论“中学为体”的终结

社会解体与革命演进的生态互动关系

徐志摩的新婚故居与蜜月书简

2000 年 ● 第 1 期

世纪书窗

2000 年第 1 期(总 1 期)

目 录

- 1 发刊词——陈 昕
- 3 义和团运动百年祭
——兼论“中学为体”的终结——朱宗震
- 14 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来自“断代工程”第一线的报告——梁 溪
- 21 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及其限度——晋荣东
- 29 不废江河万古流
——由唐诗选想到唐诗学——朱易安

新书导读

- 36 了解和研究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重要文本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内容简介(范蔚文)/专家点评(汪道涵)/导读(任逸舟)

品书录

- 43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与德里达
的《声音与现象》——张祥龙
- 49 超村际的文化聚落
——读《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札记——夏一鸣
- 52 本田成之与《中国经学史》——陈居渊
- 58 明恩溥中国观之我见——毛 新

文化旧闻

- 63 上海书业公会史———陈乃乾
67 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虎 闾
70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简史———蒋春牧
75 郑振铎在“四一二”前后———俞筱尧
79 中国研究藏书票的先驱——叶灵凤———张 伟
82 徐志摩的新婚故居与蜜月书简———虞坤林

语词林

- 84 东东———罗建平
86 酷———罗建平

书摘

- 88 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一种阐述———倪乐雄
95 社会解体与革命演进的生态互动关系———王北固
102 世纪断片———〔德〕君特·格拉斯

109 阅读前哨
115 世纪书情
120 书市热点：开发西部
121 集团记事（2000年1月—2月）
123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编辑手记

“金瓜子”及其他（顾静，51）/关于吟咧的轶闻（盛巽昌，81）
/错得离奇的翻译（史适，108）

- 封二 漫画书评———戴逸如



由上海 5 家著名的出版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和上海图书公司（含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组建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已经运作整整一年了。过去的一年，充满激情，充满挑战。我们确定并贯彻了“三个确保”和“三个推进”的总体工作思路，以出书工作为中心，以“双庆双迎”为契机，以业务重组为抓手，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发行重组和财务重组等工作，集团开始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全国出版业的面前，出现在全国读者的面前。然而，集团要真正成为一个整体，最根本的还在于出书工作的重组和新的出书风格的形成。在 2000 年，我们要以编制“十五”出版规划为抓手，通过实施品牌战略，重新配置各社图书资源，合力开发新的精品力作，建立强势出版领域，完善学科建设，来塑造集团出书工作的整体形象，并最终形成集团和所属各社的风格和特色。要走完这极其重要的一步，我们需要有一份刊物来沟通上下的情况，统一大家的思想，探讨关心的问题，于是乎，《世纪书窗》应运而生了。

《世纪书窗》的任务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集团本身的建设，它还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以中等以上文化程度

的读者为主要对象的读书刊物，起到出版者与作者、读者桥梁的作用。出于这样两个目的，《世纪书窗》设置了学术论坛、书评、文化史料、书摘、编辑札记、世纪书情、阅读前哨、书市热点、集团记事等有关栏目。意在通过这些栏目，不仅使集团全体员工，也使广大读者了解国内外出版业的动态和趋势，学界的发展和进步，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动向，以及新发现的珍贵的文化史料；知晓专家、学者对有重大影响的图书和出版潮流所作的深度评价；欣赏集团在版的各类畅销书的缩写或摘录；感悟编辑在审稿过程中的创造与考辨；选择国内外包括集团的各类图书，掌握大量的方方面面的文化信息；观察集团在建设大型传媒集团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奋斗，参与集团出书品牌的创建和风格的形成，等等。

办好《世纪书窗》，当然有赖于编辑部全体同志的激情、追求、努力和创造，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集团的全体同仁、我们的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到办刊的过程中去。只有这样，我们的这份刊物才可能有清新的文风，密集的信息，深刻的内涵，开阔的视野，以及意在书外的触角，才可能赢得更多读者，才可能在集团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世纪书窗》这株幼苗早日培育成苍天大树。

陈昕

义和团运动百年祭

——兼论“中学为体”的终结

朱宗震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在长期形成的观念下,义和团运动的意义集中在反帝的问题上。但随着时代的推延,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自然产生了新的认识。问题在于,这场运动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义和团运动中利用邪术来抵抗列强侵略,清廷的文化观念也就走上了绝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伦理的“中学为体”的文化观念也就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而终结。此后,全盘西化的思潮开始发展起来。

一、“中学为体”的心路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的龚自珍和魏源主张变革,但是,他们并没有能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老大帝国最先进的文化人,同样具有老大心态,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滞后,是整个时代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社会危机,发生在土地问题上,也就是农民问题。龚自珍做为时代的先进分子,并没有摆脱传统的重农轻商、务本抑末观念。龚自珍的《农宗》是一篇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他把地主和农民分成四等:大宗、小宗、余夫、闲民。以此来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他盲目乐观地说:“木无二本,川无二原,贵贱无二人,人无二治,治无二法,请使农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万国。”

1838年,林则徐奉命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深思熟虑之后,向这位钦差大臣秘密上书建议,除禁止鸦片外,同时限制对外贸易,闭关自守:“食妖宜绝矣,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蚕桑、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对于未来战争,他以傲视天下的豪气,十分自信地判断:“至

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人，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舢舨也。伏波将军则近水，非楼船将军，非横海将军也。况陆路可追，此无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林则徐复信大加赞赏：“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这是两位对世界局势无知者的对话，可是，他们却代表了当时中国前卫者的思维水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通过战争经验，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那就是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入侵者虽然绑着裹腿，但腿脚很灵活，不是用一根长竹竿绑上利器就能打倒的，而且西洋人在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方法上占有优势，因此，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学吗？对不起，没有了。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长技”并不难学，事实上那时的西方技术也很简单。所以，他们可以继续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从事变革，而“不变者，道而已”（魏源语）。说得很轻巧，但恰恰在这个“道”上，负载着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中国的士大夫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上上下下仍然处于对外的和平麻痹状态，二十年过去了，鸦片战争得来的一点小小的见识，竟然没有人去实践，在“师夷长技”的问题上，几乎毫无进展。所谓“启蒙”问题，当然摆不上士大夫的话题。西方的武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中国人仍然固步自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最精锐的僧格林沁的骑兵部队，尽管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仍无法阻挡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军。

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从地方上崛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组成的湘淮集团，在战争的实践中重新认识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们在对清王朝进行局部改革的同时，发起洋务运动，引进西学，中国人终于开始实践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在“道”的问题上，也就是在传统的文化和社会体制的问题上，仍无重大突破。曾国藩本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自不必论。洋务派的主角李鸿章就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洋务事业上不如李鸿章的左宗棠，还在念念不忘“务本”，也就是要以“耕读”传家。对于西方先进技术，他还不

愿意让圣贤之徒去介入,而只要工匠们“以因为创,坐收其益”。

洋务运动毕竟打开了一扇接纳西学的小小的侧门,不过,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士大夫,一时还很难发现西方文化的精髓。他们在对西方文化惊讶之余,开始只是认为西方实现了中国三代的理想之治,因而并无反省之意,只须“礼失求诸野”而已。陈炽为《盛世危言》作序说:“我恶西人,我思古道,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我虞、夏、商、周之盛轨,揆情审势,旦暮之间耳。故曰: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我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王韬的跋文更明白地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薛福成认为:“总而论之,其道如墨子,故必尚同;其政如商鞅,故必变法。”“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中国传统文化在东方长期一枝独秀,漫长的积累和封闭造成思维模式的顽固性,这种既成的历史状态使精英分子都难以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文化的更新十分缓慢。在鸦片战争后半世纪内,当日本社会开始迅速更新的时候,中国的士大夫仍然在卫道不变。个别人的前卫思想,也为社会的保守思想所淹没。只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战败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开始惊醒,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因此,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激发了启蒙,如果没有中日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中国的士大夫还会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醉生梦死,何况当时还有“同治中兴”的梦幻。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强烈地冲击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他于翌年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上述政治主张尚未见之于公开的纲领。而且,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还很微弱。维新运动则在国内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们否定“中学为体”的政治主张也还不能形成公开的改革方案,我们目前甚至很难从他们自己当时的文献中看到,而往往要从回忆中,以及反对派的批判文字中,才能了解到他们当时冲击政治文化体制的激进的言论和思想。《翼教丛编·序》批判梁

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言论说：“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但是，维新派并不敢把他们关于开设议院与国会、实行立宪的主张公开发布。激进的维新派谭嗣同，“冲决网罗”，冲击“三纲五常”的言论也还不能刊布。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时务学堂时“传播革命思想”云云，也只是一时的放言高论而言。

戊戌时期，少数精英层面的区区“启蒙”思想，对旧体制下人民的生活还影响甚微。我们在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他们的思想不为基层的人民所接受。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很快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击。洋务运动在进行过程中，本来就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在维新运动初起时，洋务派对维新派也存有合作的希望。但一旦涉及政治文化体制的根本问题时，洋务派就不能不和顽固派一起反对维新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著《劝学篇》，总结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划清了与顽固派及维新派的界限：“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他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戊戌变法期间，学务大臣孙家鼐为新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制定教学方针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因此，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学为体”仍是中国社会上盛行的主导思想。

二、传统文化下排外的统一战线

中国的士大夫都是政治动物，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对经济领

域生活的领悟更为困难。因此，少数精英人物单纯在政治层面上的觉悟，由于现代经济生活发育的滞后，缺乏社会依托，它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社会上发生了保守顽固派的大反动，他们几乎排斥一切学习西方的变革，连洋务派都受到他们的压制。当时，“凡言变法诸臣皆得罪”（《慈禧传信录》）。张之洞“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李鸿章竟至“都人多目为康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在人文经济落后的北方出现了义和团运动的蔓延。

教会深入中国腹地，是在列强侵华势力的保护下进行的。教会在中国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但教会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强权势力，深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发生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地方官吏仍抱着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愚昧保守，思想闭塞，面临着中西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而形成的社会冲突，毫无办法：“畏事者祖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之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结果，“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为了增强力量，受教会压迫的地方，引进游民成分充塞的会党势力，也是很自然的：“义气相尚，心必直爽，路遇不平，不惜驱命代为伸理。”袁世凯分析当时形势，指示山东各地方官说：“照得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地方官非不习知其弊，而苟且偷安，终不能设法以平之。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官正亦苦无如教何也，亦思借民以快报复，有仇教者，不但不肯查禁，或对众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结伙聚徒，当知良民之为教民欺凌也，辄诬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抢掠教民。”袁世凯的这段话，很全面地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发生时的社会关系。当时，受到教会强权保护的不是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人数很少、成分复杂的教民，他们横行乡里，打破了封闭的传统秩序。结果，教会势力引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下各层面的普遍反对，也就是“民教积不相能”，官吏暗中支持仇教活动。中国社会官绅之间，历来既有互补又有冲突的一面，官吏既无能控制地方秩序，国家政权的职能受到削弱，具有反体制倾向的民间势力超

越官府膨胀起来。同时,列强在华的侵略活动,加剧了传统的天灾人祸,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危机,民众求生的骚动、游民社会的活跃被组合到了反教会活动中,这就是“不逞之徒”和“乡愚”的加入。本来,这种农村骚乱的形势,很容易发展为反政府的暴动,但由于教会和列强侵华势力和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在反教会活动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乡绅们,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不是如太平天国时的石达开和韦昌辉那样,参加到反政府的暴动之中,而是把社会冲突的焦点指向了教会和列强在华势力,减弱了与当权者冲突的倾向,义和团的口号就成了“扶清灭洋”。教会和列强在华势力,在中国社会里引起的普遍反感心理,致使他们成了中国社会发生危机时基层群众集中攻击的对象,运动进而发展为普遍的仇外活动。这就是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意义。这里要附带说明一句,基层的乡绅地主,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和中央王朝的官僚系统存在矛盾和冲突,成为所谓“农民起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水浒》中的领袖人物即多为乡绅地主。因此,把叛逆的乡绅地主和所谓“农民”领袖作严格的区别是难以成立的。

民间势力的膨胀,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一种叛逆的因素,因而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镇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很清楚这一点。吴桥县知县劳乃宣就曾指出:“义和拳之必反,凡有识者,无不知之。”袁世凯也强调指出:“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撻五洲,尽驱彼族,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响迓,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但是,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使统治阶级在对待义和团的策略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关键是,清廷的传统保守派的统治也受到了列强的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和光绪皇帝得到列强的同情和保护,慈禧废黜光绪的企图遭列强的干预。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半官方的身分,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于是,慈禧要“己亥立储”的办法,即于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继桃同治。然而立储之举也在国内外遭到强烈反对。当时,慈禧“欲遂立溥儀,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渐,日夜谋所以报”(《庚子国变记》)。参与发动戊戌政变、掌握朝政的是一批坚持传统政治文化体

制(中学)、排斥一切西方文化的保守分子。那些当时的满族亲贵,大都顽固、愚昧、守旧。载漪就“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甚至朝思暮想希望有“剑仙侠客”来杀尽外国人。大学士徐桐“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名于门,拒其进见”。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他作为兵部尚书,甚至认为:“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申屈弗灵,必非我敌。”(《慈禧传信录》)还停留在鸦片战争前的观念上。

在复杂的时局面前,民间异端文化和正统文化观念出现了临时的联结。原本是对立的文化观念,但因为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产生了某种一致,当时盛行的义和团揭帖,就反映了这种联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升黄表,焚香烟,请下八洞各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此类揭帖同样内容的,当时流传有多种,此处所录仅是其中之一)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民间动员方式结合在一起,矛头指向列强侵华势力,同时指向西方文化的物质载体。另有一揭帖则更强调了正统的观念:“因以外教邪术迷人,上天恼怒,差众圣下界,赴坛传教子弟,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教,不准公报私仇,以贫(富)压富,依强凌弱,以是为非。”

本来,在民间就有种种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并有种种邪术流行,在社会动荡时期,往往被秘密会社作为动员群众的武器。川楚起义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都有类似的功能。所以,劳乃宣说,义和团“实系邪教,久奉明禁”。民间的反洋教活动,遭到了用洋枪装备起来的教堂的顽强抵抗,使反洋教的斗争受到挫折。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六十年间,西方的火器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民间的冷兵器,即使碰到教堂的孤立据点,也已经无法如鸦片战争时能与火器抵敌,在把骚动的群众组织到反洋教活动时,一种速成的邪术被引入到义和团之中。

本来，硬气功的刹间刀枪不入（并无实战意义），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但这时，到处设坛演练，一天之间即可产生刀枪不入的“神力”。当时，“因练拳而致邪崇附身，竟成疯癫者，传闻藉藉，愚民之愚，令人不解”（佐原笃介《拳事杂记》）。显然，这种演练，在符咒中引入了有毒的汞一类兴奋剂。这是传统的民间叛逆文化适应形势的演变，进行动员的手段，以此来助长他们“灭洋”的幻想。

民间的一般的多神崇拜和正统文化没有必然的冲突，但邪教的叛逆倾向为官方所忌讳。不过，这时因为民间异端文化矛头指向西方在华势力，减弱了叛逆的倾向，而民间的邪术，也勾起了清廷愚顽的保守派战胜列强的幻想，因此，民间异端文化为清廷所接纳。1900年5月间，当义和团在京畿、直隶地区发展时，慈禧令刚毅、赵舒翘等前往涿州一带“宣抚”，刚、赵回报，则“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端郡王、庄亲王及许多顽固大臣，无不信拳匪为真神下降”，载漪认为：“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不仅自己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且把义和团引入宫中，在西太后前演练刀枪不入之术。慈禧后来说：“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忠勇，怎样守纪律，有法术，指影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庚子西狩丛谈》）徐桐对义和团的兴起，十分兴奋，以为“中国自此强矣”，有赠义和团大师兄联一幅：“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这一联出自上层人士，更典型地表明了传统文化下各阶层在盲目反对西方文化前提下的联结。

于是，清廷采取了把义和团纳入到自己的反对列强的系统之中，成了一个特殊的盲目排外的统一战线。5月28日，列强在华外交团决定对中国用兵，中外形势紧张起来，清廷面临着和战必须决策的局面。6月6日起，慈禧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和光绪、各大臣间发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最后顽固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载漪强调：“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光绪反驳说：“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慈禧最后支持载漪：“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

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力量对比的前提下,林则徐可以对自己的基层组织,即“民心”寄予希望。但在1900年清朝精锐武装已在甲午一战溃败,中外力量悬殊,地方基层组织,一没有现代组织能力,二没有火器,而且游民成分充斥,在无知支撑下的所谓“民心”,又怎能转化为战斗力?不顾现实环境的所谓“人心”,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教条。慈禧最后作出宣战的决断:“今日大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叩首道:“臣等同心报国。”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声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清廷主战派君臣毫无现代国家观念,在传统的江山社稷、忠君爱国观念支配下,进行无知而盲目的战斗。清廷于23日又命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强化对义和团的控制,利用义和团血肉之躯与列强决战。

三、“中学为体”的终结

义和团运动时,有一条揭帖,大意说:“二十九日(1900年5月27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各学堂学生逃走一空。这条揭帖典型地表明了义和团对西学的盲目摧残。义和团在北京专杀自如,焚烧掠杀,对商业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充分反映了义和团游民成分对社会的严重破坏性。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造成了自己空前的统治危机。慈禧已经无法控制北京的局面,后来她对人说:“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统治者死抱住三纲五常的中学不放,顽固地拒绝一切改革,竟至愚蠢地利用民间邪术来抵抗西方入侵者,表明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制已经走到了绝路。

清廷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招致了更严重的外患,八国联军入侵,占领了北京。清廷再次向列强俯首称臣,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只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洋人的朝廷。列强虽然保留了慈禧的地位,但压迫慈禧严惩以载漪为首的十大臣,另一

批顽固派大臣,如徐桐、李秉衡已经在战争中死亡。

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各种力量是互动的,相反又相成,相生又相克。中国内部自身改革的力量不足,无力战胜封建的顽固派,群众的骚动只是破坏了清廷的统治秩序,而没有破坏传统的观念,反而是列强侵华势力把最顽固的保守势力从中央政府中清除了。清廷不得不改变态度,于1901年1月29日下变法诏,表示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进行改革。不久成立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洋务派领袖如李鸿章、张之洞在清政府中重新活跃起来。但是,清廷想重新回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路线上,也已经不可能了。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连及清王朝在内,都失去了权威,失去了人民的信仰。义和团运动期间,维新派策动了自立军起兵“勤王”,孙中山则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志士投向了反清革命运动,革命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清王朝之必倒只是时间问题了。

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时,连开国会的主张都不敢公开提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的权威陡然下降,出使日本国公使李盛铎于1901年6月首先上奏,要求“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忧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意,明定国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更公开地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黄遵宪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虽然,或以渐进,或以急进,或授之自上,或争之自民,何涂之从而达此目的则吾不敢知也。”也就是说,不论通过什么途径,传统的中学为体,也就是君主专制主义,是必然要被淘汰了。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在国内外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就是洋务派官僚们也不能不放弃原先“中学为体”的主张,倾向于君主立宪。1904年间,张謇就为张之洞、魏光燾草拟请立宪奏稿,并应张之洞的再三要求,张謇不顾与袁世凯不通问已经二十年的冷漠私情,写信给袁世凯,动员袁支持立宪。袁世凯虽然复信表示“尚须缓以俟时”,但同意君主立宪的主张,已无疑问。后来,袁世凯联合各省督抚促请清廷同意实行立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王朝在形势的逼迫下,在口头上也已不能不放弃“中学为体”,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

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也就是在政治体制上承认了西学的优越性。但是,清王朝已经彻底腐朽,它求立宪也不可得。中国社会的年轻一代士大夫,在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面前,更倾向西学,高歌“十年前是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宁调元语),留日学生中,“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孙中山制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指导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所谓物极必反。作为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形成的传统文化全面排斥西方文化的反动,中国社会开始露出了全盘西化思潮的端倪。面对西学的盛行,连共和派也不得不考虑西化思潮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中学的“体”,而是突破“中学为体”之后,如何保存传统文化,保持民族的独立性。章太炎在上海狱中被释放流亡日本时,在东京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孙中山在回答这类问难时,也不能不考虑:“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他后来制定出五权宪法,来表现这种独立性。但这一切,同“中学为体”(三纲五常),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在体制问题上,至少在理论上,都倾向于学习西方,也就是“西学为体”。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中学为体”思路的终结。

因此,可以这样说,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侵略失败之后,中国社会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同西方的巨大差距,开始走上了漫长的启蒙道路。辛亥时期,思想的启蒙实际上仍然只是停留在少数精英、英雄人物身上,“五四”时期,启蒙思潮才刚刚向国民的方向扩展。而文化落后的中国,国民的启蒙,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能依靠少数精英人物的愿望,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大都出于这两部资料集)

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梁 溪

——来自“断代工程”第一线的报告

一、概 况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社会发展十六个“重中之重”项目之一。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自古以来,绵延流传,没有中断,世所罕见。但是,目前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古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历代学者都曾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做出过许多积极的贡献。但是,年代学涉及的领域很广,而个人的学识能力与研究手段都很有限,所以在关键的年代上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5月正式启动,总目标是要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商周年表。“工程”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情况的分析、估量,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联合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学等学科的170余位优秀学者,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经论证共设9个课题,下分40个专题。每个课题、专题,都尽可能联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研究途径主要是:

1. 对传世文献和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 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仪)的 ^{14}C 年代